

開擴與融鑄

(上)

趙汝明

《二十世紀中國佛學問題》一書論衡

一、前言

說中國佛教思想的傳衍，具有非比尋常的脈絡可見。這個意思，吾人當可以就相關的理念內涵，而給予肯定。此間二十世紀中國佛學的傳衍，無疑地亦會具有非比尋常的意義。若要探問這個底蘊何在？倒實都有明顯的脈絡可見，此中確切的因由就是，離不開若干實質的文化背景而為說。二十世紀中國佛學的發展，有它相當顯豁的機緣，筆者如此申述，即是要指出：中國佛教思想發展至近代，之所以呈現一大轉向，並非偶然而來，就其實質的文化背景而言，吾人自可以從某些內在或應然的理念窺見出來。職是之故，說二十世紀中國佛學的傳衍，有何特殊的底蘊可尋？此間亦可以從若干實質或應然的文化背景，而有所採擷。中國佛學理論的徵解，與古今中外許多學說一樣，都會循著特殊的機緣，而呈現異常的風貌與格局。因此，就其相關的理念來申述，二十世紀中國佛學理論的發展底蘊，大抵亦可以從

文化背景這個向度推判出來。而傳統中國佛教的學人，素以標舉大乘為極致，它所揭現的向度，究竟有何特殊的含義？此一徵問，或許可以視為一種辨解的肯定。因為這種肯定，固然不能離開自家的精神底蘊。然此間所謂「精神底蘊」，究實看來，亦可以視為一種表徵。中國佛教思想的發展機緣，若要置於若干實質的歷史意識與文化背景上，給予某方面的徵解，然吾人自可以不難明白：這種具有歷史意識與文化背景影響之下，而締造出來的表徵，大抵都會呈現某些道統格局。

說二十世紀中國佛學理論的發展，有何特殊的底蘊可見？此中當可以從某些道統格局下窺探出來。置於此等格局來理解，無疑地是可以成立的。國內武漢大學麻天祥先生的近著，就是致力這方面的探究。麻先生這部專著很有風格，名為《二十世紀中國佛學問題》，二〇〇七年四月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印行，凡三十四萬餘言，前後共計七章，另附二篇專題長文。揭示所謂「問題」

一詞而為書目的綱格，固然是有它相關的理念可言。這些要旨，容後逐一予以申述。

筆者披閱中國近代諸位名家的佛學研究專著中，援引思想史或觀念史的層域來探問者，為數亦不少。而麻先生是其中的表表者，之前就相關的論題，筆者曾參讀過他二種專著，分別是：《晚清佛學與近代社會思潮》、《中國近代學術史》，而此間涉及的論題與綱維，大抵都是圍繞著佛學理論的傳衍這方面。至於該書何以問世？究實看來，固然可以就作者自撰的意念，而有所肯定。到底是何機緣致使該書得以完成？此一設問，也許都是作者獨到的見解吧！於《二十世紀中國佛學問題》一書的前記裡面，作者就有這樣非常極致的看法：

顯然，《二十世紀中國佛學問題》不能算是原創，而是在《晚清佛學與近代社會思潮》的基礎上的修訂，是從「問題」的角度審視二十世紀佛學及佛學研究的。問題涉及佛教的入世轉向、佛教哲學研究，以及近代思想家對佛學的兼收並蓄……。其實，辨析問題的核心正是出世、入世，時至今日的人生佛學的理论建設和社會實踐，顯然以此為濫

觴。這既是時代的需要，也是思想邏輯發展的必然。即使如以辨析有無，分析名相，排遣名相為重心的唯識學，也是要「從現實的革新處下手」（名秋逸語），無處不有參與社會、直面慘淡人生的痕跡。

二、理念的開擴

確實，舉凡一時代的學術思想（概括宗教性），若要有開擴或傳承，切實而有效的條件是需要的。中國近代學術思想的格局，與以往有所差異，究其原因，這都是涉及客觀的情境所致，從而在既定的發展向度上，呈現出所謂「革新」的樣態。（然有時賢往往會套用「革新」這個激進詞意，而為究竟的歸趨）中國近代佛教思想的發展，明顯地亦會隨著當時盛行的思潮，而呈現出另一番樣態。可以說，這種格局，內裡都會流衍著某些特殊的意涵，就以中國佛教思想的發展方向來徵解，之所以會呈現若干程度上的轉變，倒實是有相關的因由，而社會思潮的推演，無疑地都會助長轉變的機緣。舉凡一時代的思潮，之所以取得顯豁的發展，最主要的因由就是客觀情勢的流行。中國佛學理論的發展，與其他思想學說一樣，都會隨著相關的機緣，而呈現其

鮮明的格局。然此間所謂「鮮明的格局」，究竟有何實質的意義可言？這都是值得探問的課題。筆者揭示這個意思，固然可以從文化背景或內在契機來判問，此即是：中國佛教思想的發展，何以在宋元二代之後，便不斷地邁向疲弱的一途，這倒實值得吾人深切思考。職是之故，說中國佛教思想的發展，至近世有何特殊的背景可尋？客觀情勢的彰顯，大抵都是此中的因由。

中國近代佛教呈現非比尋常的變動，就這一歷史文化發展的軌跡來推判，明顯地可以得到很充分的理解。晚清佛學的特殊發展，誠然可以視為明確的標識。這個意思，究竟有何實質的意涵可言？關涉到這些特殊的理解向度，吾人固可以從晚清以來的社會思潮，給予通貫的論證。此間所謂的社會思潮，就其範疇或層域而言，大抵都是指向人際關係方面的倫理觀念，以及社會關係方面的政治思想此等意涵。此外，亦會涉及人與自然關係方面的哲學思想。確實，從晚清佛學的特殊發展而為推判的根據，這是很可取的。此中應當可以作這樣理解：晚清佛學的特殊發展，具有重要的開擴意涵，而這種意涵，亦可以視為復興的表徵。該書於前卷曾標舉「宗教向度」此一意涵，而為探究的根據。這樣理解是不錯的，因為中國近代佛教的變動，從某個層域上來審察，都會涉及宗教向度這種精神底蘊，而晚清以來的

思想家，似乎都有一種顯豁的宗教向度，亦以此彰顯其極致的信念。關於這種宗教向度有何效能？它對二十世紀中國佛學的傳衍，有何重要的意義？復次，說近代佛學復興的內在契機，實與晚清以來的思想家所開擴的理念，息息相關的話，則應當如何理解？於該書的有關論旨中，作者就有相當極致而恰當評說。這些具體的意思，是甚麼？且看該書的若干演述：

現實世界的沒落為新思想清掃出一塊誕生之地，社會革命也進一步要求哲學之革命。於是，學者們開始由皓首窮經，以經學形式論證王治問題，轉向辨證思維，以哲學形式探討心性問題和經世理論。具有嚴密邏輯思辨性的佛教哲學，便成為他們首先選擇的對象。前起龔自珍，中經譚嗣同、梁啟超，繼以章太炎、熊十力等，無不從佛學中擷取真如、心識、緣起，……並借助其思辨的方式，探求人的本質，人在社會和自然中的位置。（其一，頁四）

近代中國社會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，即佛法自空門釋子涌入居士長者之間，知識界競相研習佛理而進退佛說，思想家公然為佛弟

子而兼治佛學。是以，佛學也由來世往生、極樂淨土為終極追求的外在超越，和即心是佛的內在超越，一變而為直面慘淡人生，和對實世界密切關注的世俗化的人文精神。

（其二，頁十一）

中國近代乃多事之秋。各階層人士皆有朝不保夕的危機感，都希望在此動蕩中尋求一處安身立命之所。……佛法在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中順化的結果，不僅使人們獲得了精神寄託，而且也在佛法中看到苦難人生的希望之光，和敗亡社會的解脫之道，佛法在知識界迅速擴張，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。（其三，頁十二）

援引此等見解，究實而言，的確可以就思潮的流衍這些情勢，作出若干顯豁的理解。而所謂「宗教向度」的效能，大抵亦誠如作者的理解一樣：人際關係方面的宗教向度，是指涉倫理觀念，社會關係方面的宗教向度，即是指涉政治思，而人與自然關係方面的宗教向度，則是指涉哲學思想。此等具有變革與整合的認知，亦會順理成章的成為復興的因由。說中國近代佛學邁向復興的一途，究其重要的機緣，確實可以從這些思想家

的意念中，而有所肯定。依此，亦會順理成章的催生另一番樣態出來，這就是「入世轉向」的流衍。此言到底有何實質的意義？這個課題，當然可以從變革與整合的角度而為說，但若僅就思潮的流衍來推判，則似乎不夠全面而妥貼。因為晚清以來的佛教，之所以要邁向改革這個途程上，歸結而這，都是關涉著一股使命感的顯發。這個意思，大抵都可以視為一種「自覺精神」的寫照，作者在該書若干的論旨上，給予這樣的辨解，可謂極之貼切而明確。把邁向復興或改革的一途，看作而為一股使命感的顯發。這種理念，僅就所謂「宗教向度」方面來推判，的確非常可取。把「入世轉向」的一環，看作而為革新的重要標程。這些意念，僅就所謂「宗教向度」方面來徵說，的確也是相當可取。然此間涉及的相關因由，吾人固可以從思潮流衍出來的客觀情勢，而給予實質的解答。有關這些解答，作者都有非常深刻的剖白。

僧人禪詩

空手

傅大士

空手把鋤頭，步行騎水牛。
人從橋上過，橋流水不流。